

《边城》: 东方神韵^{*}

杨玉珍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将《边城》置于东方文学的审美传统及 20 世纪现实发展的框架中, 从其诗性的叙事艺术、独特的人性守望、和谐的审美韵致及对民族诗美传统的承接与创造等方面进行审视, 揭示其所蕴涵的东方神韵。

关键词: 《边城》; 东方神韵; 审美传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4)04- 0054- 04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课题《20 世纪东方文学发展格局中的沈从文》(批准号: 00C204) 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玉珍(1963-), 女, 湖南石门人, 吉首大学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性追求, 是今天各民族、各国文学安身立命的根本。“东方”最初是西方人眼中的, 但也是东方人自己的, 是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的自我觉醒与自觉认同。东方各民族之间, 大多具有相同的社会历史进程, 往往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 悠久而密切的文化关系, 他们的文化都带有东方民族特有的传统与独特的风格, 即富有“东方神韵”, 他们的文学则具体而形象地传达出了东方的神韵。《边城》是世界上少有的几部以短小的篇幅而获得世界性认可与高度评价的小说, 以其浓郁的东方神韵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一、诗性的叙事艺术

《边城》是一部抒情的、理想主义的田园小说, 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第11卷, P45)], 用以对照腐化堕落的城市人生, 给民族的未来灌注一些希望, 写于 1933 年冬至 1934 年, 在时空设置以及叙事次序和节奏中, 显示了东方文学独特的诗性叙事艺术。

它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湘西偏僻的一个小城——茶峒, 时间设定在民国初年, 一个现代文明较少浸染彼处的时代, 为其理想的抒写辟出了一个特殊的时空。在空间安排上, 它既是具体的, 茶峒是湘西实有的一个地方; 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在每个人的梦里、在陶渊明的诗里、在华兹华斯的丁

登寺旁, 那里“水中游鱼来去, 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长年作深翠颜色, 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杏花里”, “黄泥的墙, 乌黑的瓦”, “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 一幅典型的宗法制社会的乡村图景。

在空间安排上小说形成了内外、虚实之间的呼应、对照。“实写”边城生活, 通过人物的想象与叙述“虚写”“外面的世界”, 构成了小说空间的延伸: 翠翠的父母在爱情为礼法所不容时, “下游”曾是他们梦想的爱情出路; 当翠翠面对自己前途无定的爱情, 在黄昏的景色里满怀惆怅: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 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 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大老因为爱情不顺, 下辰州在茨滩淹死; 二老由于哥哥的死、自己亲事的苦恼坐船下桃源去了。空间上的内外设置、确定与不定, 给了人物情感和人事以变化与调整的空间。“外面的世界”是不确定的, 是赚钱求利的地方, 是自我放逐、逃避感情的去处, 也是充满危险的地方。由于它的设置, 强化了边城人生的纯善、多情和诗意。空间描写上的虚实结合, 使小说获得以“小”含“大”, 在人事、人性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效果。这是农耕民族生活视界的限定性所决定的, 也是一种巧妙的艺术处理。金介甫曾说沈从文的小说“融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2](P24)], 与空间上的此种设置不无关系。

“边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而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文化概念, 它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与都市文化根

* 收稿日期: 2004- 09- 30

本对立的山村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提供了人性发展、精神展示的 深度空间。时间上以节日开头,将茶峒的一般求爱习惯与节庆聚会糅合在一起,翠翠心理和身体的成熟,与节庆聚会的人群一起年复一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与屈原连在一起的端午节成了她通向成年的桥梁。中国(或者说东方)的节日,是人的生命节律的聚合与外化,是将不断重复、循环的时间和农事劳作用节令割切、划分,春节、端午、中秋等等首先与农事节拍、大自然时序变化相关,同时也糅合了人类的生命感受、历史积淀和文化理解,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合拍以及东方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东方民族现代文学中一个突出的审美取向,是文化转型中的必然结果,回望历史,感怀生命,探索现实,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等人的创作也是如此。

在叙述方式上,“反复叙事”与“单一叙事”结合。小说前三节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作者的叙述视角由外向内,由远到近,边城从远景到近景依次呈现,最后聚焦到老船夫和翠翠身上,呈现出一幅由美德、山水胜景、独特习俗编织而成的田园画卷。在介绍主人公的日常活动和边城人的生活行为时,普遍采用“反复叙事”,使边城人的每一个动作、行为都被提炼成习惯和普遍现象。通过“反复叙事”,把个体还原到类,特殊提升到普遍,使得经验与人事得以从时间的吞噬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达至永恒。

同时,主体故事又以“单一叙事”的方式呈现,且是由情感主宰的印象式叙事。“阳光下头无新事”,这是沈从文喜爱引用的、出自《圣经》的一句话,也是自然经济、农耕文明中人们生活的常态,每天不过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种循环中,只有人的感受与体验才是真实的,借用柏格森的表述,有效的是表示“强度”的心理时间,而不是表示宽度的“物理时间”,《边城》以人物的情感取向、心理印象决定叙述的次序和节奏。前两个端午的事情穿插在第三个端午中:初一人们预习龙船竞赛的鼓声传来,翠翠陷入回忆,带出前两个端午的事情,详叙翠翠认识二老的第一个端午,略写与大老相识的第二个端午,因为大老并未进入翠翠的情感世界。作品用四节顺序记载第三个端午那天的事情,因为这次翠翠与二老的情感潜在的成了事件的中心。接下来时间是模糊的,经过“情感”尺度的过滤,只留下顺顺请媒人去为大老提亲,以及翠翠的避而不答。十四走“马路”那天那晚的情、景、人、事都是详写(凸显边城人生的诗意与浪漫),但十五那晚却是等待的落空。接下来的叙述是:“十五过去了,十六也过去了,到了十七,老船夫忍不住了,进城去找二老”,得知大老已死,自己被人误会,颇受打击。再接下来,只有“日子平平的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这种简略而舒缓的叙述冲淡了郁闷和悲哀,有助于抹平创伤。但中寨人的到来,促使老船夫再次急迫地为翠翠的婚事去找顺顺,情感再遭重创,加上天热和疾病,终于在雷暴雨的夜晚撒手而去,情感的急流至此达到顶峰,此后跌落回平缓的河道。

有人曾概括沈从文的文体特征为:先以歌咏田园诗般的

散文笔调缓缓地展开对湘西纯朴风情的细致描述,最后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前面的歌咏,把你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中^{[3](P122)}。《边城》以翠翠的情感和老船夫在孙女亲事上的努力和波折来变奏,即使风俗习惯的描写也以翠翠的情感印象为标尺,如第五节对中秋、春节和正月十五的描写,不管有事无事、冷清还是热闹,只是为了衬托翠翠与二老的相遇:“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边城》既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善叙事写景,又以人物的心理感觉推动事件,“情”既含蓄,又势不可挡。既增加了作品的抒情性,又使作品变化中有节奏,最动听的牧歌声和最忧郁的暗示交织在一起,最热切的铺叙和最突然的煞尾紧紧相连,暗含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叙事结构,构成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二、人性守望

沈从文曾说他的文学理想“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第11卷,P42)}。他通过种种人生形式的描写,着力表现人性的分野,否定那种变形的被扭曲的人性,肯定正直、勇敢、雄强、素朴、充满活力与朝气的人性。东西方人所理解的“人性”是有区别的,西方人所说的人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个人权力、欲望和要求的肯定与张扬;东方人所理解的人性,却是基于人际之间的,讲的是“人人”,它以东方封闭的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要求“顺天以和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舍弃自我,追求永恒和无限本体,实现内在世界的宁静与和谐,这是东方最高的人生境界:即印度的“梵我合一”,中国的“天人合一”,阿拉伯人的“亲近真主”。将这种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推及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追求和谐,形成了各种各样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人人在伦理化的等级范围内生存活动,形成了以“善”为中心的人性范畴。

《边城》的“人性”内涵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珍视、对爱的尊重、对人的真诚、对职份的尽责、重义轻利、对生命和自然的诗意感受等,“流露着具有东方人特色的情感”^{[2](P159)}。沈从文自己也说创作《边城》的用意是“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第11卷,P45)}。亲情、友情、爱情交织渗透,相映生辉,表现了湘西乡村儿女正直质朴、相亲相爱的传统美德,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对于健康、诚实、热情赞颂的文化心态。

老船夫勤劳善良,本分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他都不缺少,五十年管理渡船,无论风吹雨淋、寒暑春秋,皆忠实于自己的义务职责。因为吃公家粮禄,他拒收过渡人的钱,不得已得到的好处,必超量报答,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女儿死后,他担负起了抚养孤雏的责任,负责把翠翠交接到一个喜欢她、而她也喜欢、能给她幸福的青年手上。顺顺是掌管水码头的,“为人既明事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喜欢结交朋友,豪爽义气。杨马兵,一个几十年在军营里的人,年轻时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唱山歌输了;与老船夫是朋友,爷爷死后,他担负起了翠翠保护者的责任。翠翠在自然中的成

长,本就是一首优美的生命赞歌。大老、二老都是勇敢、正直、聪明、勤劳的年轻人。

对爱的尊重尤其体现在老船夫身上。女儿与人发生了不合礼法的情爱,做父亲的却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当他深感自己一天天衰老,接近生命尾声,他着急孙女儿的幸福,但女儿的悲剧成为他在翠翠婚事上“弯弯曲曲、不利索”的主要心理动因。二老对渡船的执着,也是他对爱情的执守。当翠翠成为孤儿后,作者仍然让她的生活充满同情和关爱,表现了边城人的友善、热情与慷慨;结尾,作者还是不忍让翠翠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加上一个尽量温热的“尾巴”:象征美好人性与希望的白塔重修好了;翠翠等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东方文学作品常见的结尾是“大团圆”结局,要么“善战胜恶”,如印度的史诗和故事,以及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沙恭达罗》以及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使现实中不能,想象中也要实现。这与东方人对人性善的期待相连,也与此基础上产生的宗教有关,东方的宗教不是为了上帝的威信,而是为了人的救赎:善恶报应,或融入绝对的虚无,得到解脱。这是东方文学中特有的风景,只要将它们与西方文学如《荷马史诗》、西方戏剧对照即可见出。沈从文之所以写《边城》,起因源于1933年他的返乡,发现这个民族正被历史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他要“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1](第10卷, P318)],并把这种作品献给那些“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1](第6卷, P72)]载道教化、劝善惩恶是东方传统的文学观念。将美、善、爱结合在一起的审美取向构成了东方文学特殊的美感效果,理想主义色彩是其表征。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能给人更多的温暖和希望。

三、“和谐”之美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西方也颇不同。东方文明最初都发源于河川流域,都为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靠天而生存,祈求“风调雨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追求人与自然契合,“和谐”成为东方文学的主要追求和最高境界:不论上古的巫术精神,还是近代文学的民族精神、反帝反封,还是现当代的反殖、反霸权主义,无不以世界和谐、人性和谐为目标。而西方,以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为起点,形成了自然是人的对立面、人是自然的尺度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斗争。“冲突”成为其文学描写的中心,“征服”是其要旨。

在东方作家笔下,大自然不是人类的敌对力量,甚至不是探索的对象,他们赋予自然以灵性,在平等对话与灵魂的沟通中展示大自然的美与力。东方从古到今的大量的山水诗、咏物诗,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对“普遍灵魂”的信仰与和谐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边城》充分张扬了东方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和谐的美学精神,描绘了人与景与物的契

合,展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韵致。

“美在自然”是人类古老的命题,为不同国度、时期的人们所熟悉,并用不同语种重复表达。《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茶峒的美、自然的美、人工的美(如人家、房屋等),沈从文用“静物写生”的方法,为他的湘西画卷打上了一层空灵、秀美、神奇浪漫的底色,造成如诗如画的意境。

《边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出人与景的契合一致。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景即人。老船夫、翠翠与他们周围的环境——青翠的竹篁、自在的溪流、溪边的白塔、方头的渡船、迷蒙的雨雾、古朴的民风、家中的黄狗……契合得如此紧密。翠翠那合乎自然节律而萌动的春心,在期待中含着羞怯的少女情怀;天保傩送兄弟在爱情方面虽不奉让但也不乏手足情的公平竞争,顺顺的豪爽率直,无不让人体察到景与人胶合而形成的独特边地风味。连人物的相貌也吸取大自然山水的灵气,如翠翠的相貌和性情。作品情势的发展节奏也与大自然协调一致:下端午雨、涨龙船水的朦胧、清新——爱情的萌生;十四、十五月明、月圆的清丽——爱情的发展;六、七月(黄梅雨季节)的沉闷、粘湿——情感的受阻、搁置;雷暴雨之后的平歇——情绪宣泄、恩怨了却之后的平明、宁静、淡然。渡船、白塔与老船夫的生命,翠竹、大鱼、虎耳草与翠翠及其爱情等,无不有着内在、紧密的关联。这种和谐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也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正如沈从文在《湘行散记》所说:“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1](第9卷, P284)]

泰戈尔曾说:“文学在和谐的光辉里向我们显示一幅完整的图画,从而使我们享受到快乐。这光辉就是美。”“美是人和自然、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感的表现”^[4](P67)]。和谐是东方审美理想的集中表现,古来如此。印度著名的戏剧《沙恭达罗》是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完美的爱情及人与自然、与人性自身的统一和谐使其闻名世界。自然美与人情美的融洽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精神,他们常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来表述^[5](P21)],不论是《源氏物语》、俳句还是川端康成的作品或者他们的茶道和插花,都显示了这一传统。优美、和谐的人性和自然的描写,并以此来展示社会人生与人类情感,这是东方人独特的人性思考和审美表达。

四、诗美传承

20世纪东方现代文学是亚非文化转型的产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形成了启蒙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两大思潮,在审美风格上出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两大分野。启蒙文学是以欧美文学的翻译引进为催化剂和先导,以改造国人、救亡图存为文学的目标,以求赶上世界文学潮流。民族主义文学则以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为己任,继承传统,追求民族风格。

过去一提“传统”,就会与“落后”、“保守”、“反动”等词相连,艾略特感叹:“除非用作贬义,这个词就很罕见”^[6](P1)]。

“文化守成主义”一词,是在经历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撞击之后,对于东方后发国家在被动现代化过程中,过去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复古派的历史文化作用的正面表述。指的是—些知识精英选择“体与用”、“精神与物质”、“中与西”等对立的二分法,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以此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乡土抒情文学出现,它们直接传承、建构了中国古典的诗美传统。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则是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的文学典范。

《边城》所写的茶峒并不是现实中的茶峒,而是经历了作家主体情感过滤和理想投射后创造出来的,多了一份理想、一份温暖、一份诗意,有人说《边城》的各节“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7](P39)}。小说虽说写了爱情,但爱情并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小说叙述了翠翠与祖父相依为命的平凡而宁静的人生,以及他们平凡宁静人生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薄薄的凄凉”。作者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祖孙俩生活的孤独清贫,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构成了一幅象诗、象画、也象音乐的优美意境。为了强化边城民风纯朴,甚至将妓女接客这种极端的事情也理想化了。所以有不少人都以“牧歌”来指称《边城》:“牧歌特指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各类作品中能够反映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8](P38)}。从此角度,《边城》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边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成功负载实有赖于它对民族诗美传统的继承创造。

和以前写湘西的大部分作品相比,《边城》没有那份原始蛮荒状态和原始初民的野性、强力的元气,情欲的成分逐渐消退,代之以更节制的爱情表现,优雅、克制,滤尽了情欲色彩,一切都深合传统道德。创作风格转向了典雅、清丽的古典美,浸润古典文化的意象纷至沓来:小溪、竹林、农舍、白塔、渡船、龙舟、狗等,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一切情感都写得很克制,即使爷爷死后翠翠的悲伤,也不是痛不欲生的狂猛宣泄:守夜时秃头陈四四说了一个夹杂有粗野字眼的笑话,黄狗在屋外吠着,翠翠开了门,到外面去站了一下,“耳听到各处是虫声,天上月色极好,大星子嵌进透蓝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翠翠想:‘这是真事吗?爷爷当真死了吗?’”一颗大流星使翠翠轻轻的喊了一声“呀……”,“接着南方又是一颗流星划空而下。对溪有猫头鹰叫。”即使在悲伤的夜晚,心也如夜的星空澄澈、宁静,人的死是向宇宙的回归,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宇宙观构成了这种清丽典雅的古典美风格。

淡淡的凄凉和悲悯感也强化了作品的诗性之美。“美丽总是愁人的”^{[1](第9卷, P175)}是作者人生体验的感喟,是沈从文在营造他的牧歌时发自内心的感慨,在《边城》中也是如此。作者在为我们描绘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时,却无法不体味到老船夫和翠翠单纯生活中的孤单与悲凉,翠翠心中时常会涌出“薄薄的凄凉”,这是少女青春萌动而又茫然无

依、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凉与忧郁,翠翠对生活朦胧的期待,孤独的心灵、淳朴的心境,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诗意的表现。爷爷心中的焦急,时常浮起的女儿的悲剧,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使得他在翠翠的婚事上有一种有力使不上的无奈感。大老的死、二老的出走、爷爷的离世,迅速将一个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是多么无奈。朱光潜曾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2](P3)},这何尝又不是东方民族近代以来的沉忧隐痛。而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得小说获得了一种隽永的审美品格。沈从文小说的美感不是来自离奇的故事和紧张的情节,而是来自一种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弥漫的情愫。

《边城》的语言也是极美的,既具有生活气息,接近自然,清新、明朗鲜活,又含蓄、蕴藉深厚,神韵具现。在文字的简省与含蓄上,有着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雅致与朴素。只上过小学的沈从文,其文学的语言却与林语堂、穆旦等人的一起被视为构成了中国文学“五四”以来文人化的语言传统。国外有不少学校将《边城》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另一部可以与《边城》对照的作品: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它以老渔夫桑提亚哥与大海、马林鱼、鲨鱼的斗争展示人“打不垮”的精神面貌。《边城》写出了东方自然与人性的纯善纯美,诗情画意及现实人生淡淡的凄凉、隐隐的悲哀,为理想的社会人生作一素描;《老人与海》则写出了西方人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冲出悲观绝望的罗网、寻找人的尊严与自我价值的努力。前者在景、人、习俗中描述人生态度的形式,后者则将人剥离出社会环境,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阐述人生哲理与生存理念,几至寓意的程度。二者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学中篇小说的“双璧”,是东方神韵与西方风采的典型代表。《边城》受到世界读者的喜爱,在于它所展现的东方神韵及所具有的人类普遍性价值。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2] 朱光潜,张允和,我所认识的沈从文[C],长沙:岳麓出版社,1986.
- [3] 王晓明.潜流与旋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4] 倪培耕,等译.泰戈尔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5] [日]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A],川端康成散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
- [6] [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 [7] 汪增祺.又读《边城》[A],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 [8]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下转第66页)

1992.

- [5]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 骚动的灵魂[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6] [美] 福克纳. 我弥留之际[M]. 李文俊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0.
- [7] [美] H·R·斯通贝克.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序)[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 [8] [美] 福克纳.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 [9] [美]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10] [美] H·R·斯通贝克.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序)[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 [11] Robert E. spiller. 美国文学的周期[M]. 王长荣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 [12] 夏志清. 文学的前途[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13] 沈从文. 沈从文别集·友情集[C].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 [14] [美] 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书信选[M]. 纽约: 兰登书局, 1977.

“ Water ” and “ Tree ”

——“ Country Folk ” Shen Congwen and Faulkner

LONG Hui-pi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Shen Congwen and Faulkner, calling themselves “ country folk”, were well-known literati in the 2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 water” and “ tree” which symbolize the country lif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in their literal creation and then argues that the similarities in their works result from their down-to-earth spirit and conservative ideal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Faulkner; country folk

(上接第 57 页)

“ Border Town” Oriental Charm

YANG Yu-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views “ Border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 esthetic tradition and the 20th century development reality and examines its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and singular creativity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nature, harmonious charm of esthetics and national esthet tradition so as to reveal its unique oriental charm.

Key words: “ Border Town”; orient; charm